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满洲』民族共同体 形成历程

孙静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大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文库

『满洲』民族共同体 形成历程

孙静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孙静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 / 孙静著.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8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ISBN 978-7-80722-558-4

I. 满… II. 孙… III. 满族 — 民族历史 — 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K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8671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8⁵/₈

字 数: 23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侯俊华

定 价: 30.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5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E-mail: lnmz@mail.lnpgc.com.cn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族裔”认同与中国民族史研究

姚大力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民族史领域里正在形成一种十分值得重视的新研究取向。我们也许可以称它为“边缘视角”。

在中国，汉族占据了全部人口中的十分之九以上；汉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长期处于核心成分的地位。就此种意义而言，民族史的研究对象原本就带有“边缘”人群的性格。不过，以“边缘”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着这一研究就必定会从“边缘视角”出发。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中国民族史以及边疆史地的学术传统所一向采取的，其实主要还是某种“中心视角”。正因为如此，前述新取向，可能会推动着民族史研究的风格发生若干重大的转变，例如从着重关注中央王朝的治边策略与治边实践转向更多地关注边陲地域社会自身状况的变迁，从聚焦于汉一少数民族关系史转向互动背景下以相关族群为主体的叙事，从着重关注政治—军事层面转向对族群社会内部经济、文化及人—地关系的研究，从主要依靠汉语历史文献转向更多地关注田野调查、民族语文资料和口头传说，并且把对于民族语文资料的文献学解读和民族史的宏观叙事更密切、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由于“边缘视角”的采纳，一个曾在过去的民族史研究中被长时期忽略的层面，于是便在研究者的视阈内突显出来。这就是某个特定的人群如何在与“他者”接触和互动的经历中逐渐塑造或重新塑造有关自身的历史记忆，而这一主观“建构”过程又怎样从形式与内容各方面影响了该人群集体身份意识的历史变迁？人类学对所

谓“族裔认同”(ethnic identity)的讨论,就这样被引入民族史考察的范围。如果站在这一认识基点上反观关于民族的“斯大林模式”的定义,我们就更容易发现,相当多被视为民族的人们群体,其实未必同时在语言、经济生活、地域、文化等方面都具有共同性。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拥有共同语言,或者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的人群,却又并不属于同一民族或族裔群体。因此,无论民族还是族裔群体,都不可能作为“宛若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纯粹客体,脱离该族体大众的主观归属意识而独立存在。换句话说,上述主观归属意识远不只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对某个纯粹客观的外在客体的被动反映,它本身实际上还在积极地参与对那个经常被我们误以为是“自然实体”的民族或族群的构建。

在民族与民族史研究中强调族体主观认同的重要性,从更宏大的思想背景来说,可能反映了我们对传统的知识论、或者所谓“再现哲学”的反思。据此,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由他去发现绝对外在于他自身的某个纯粹客体的过程;他在“发现”它的同时也“创造”了它。惟其如此,民族或族群才会在本族体大众的主观建构下真正发育起来,成为“想象的共同体”。

其实,在过去的实际民族工作中,对民族或族群具有被人为地从主观上加以构建的属性这一认识,业已含糊地反映在“照顾民族意愿”的实践之中。到1980年代,民族社会学界似曾有意将这种主观归属意识归入斯大林模式的民族定义所指的“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俄文的“共同心理素质”一词,原写作общий психический склад。其中的склад一词,译言“气质”、“体格”、“方式”、“结构”、“风格”等;它在此处与英语中的mentality、quality、constitution等语词意义相近;因此这个词被西方学者英译为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make-up(共同心理构成)、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constitution(共同心理特征)或者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共同心理结构)。有的中国学者把它解释为“共同心理状态”,认为“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风

俗习惯、历史传统、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以及民族风格等特点，都是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具体表现”。也有人认为，共同心理素质可以被看做“民族特性的同义语”，但同一作者在另一处提到族群认同时，又说它“或者说[即]心理素质”。实际情况是，我们对“共同心理素质”一词至今无法达成某种明确而一致的界定。但是民族或族裔认同作为族体大众所共同拥有的一种集体归属意识的特定表达形式，却是能够清楚地予以辨认和确定的。

将有关族裔认同问题的讨论引进民族史研究，当然没有颠覆该学科经长期积淀所形成的诸多根本观点和基本知识。因为它丝毫不否定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享历史记忆之类“原基联系”（*primordial ties*）乃至由上述种种原基联系产生出来的“原基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s*）在民族或族群的形成、发育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族裔认同不可能基于完全虚无的凭空“想象”而得以确立；它必须以这样那样的带有草根性质的原基联系和原基情感作为自己的基础。对族裔认同的分析想要强调的只是，不应该简单地将它当作原基联系和原基情感的等同物来处理，因而忽略了对以下过程的解析，即特定人群中的精英或准精英是如何通过对既存原基联系和原基情感的有意识过滤、选择、放弃、放大、重组和重新解释，去改塑它们的现实形态，并从中提升出族裔认同这种主观归属意识的。新的分析也无从摒弃自清末“边疆舆地之学”兴起以来逐渐形成的从事民族史研究的精致方法。尽管我们断不能把族名一类符号的历史延续性看作就是某个世代传承的特定人群在历史上不断延续的证据，但符号的延续性依然经常是想象中的族体延续性得以成立的一种基本依据。因此它仍然指示着人们利用历史资源来构建“想象共同体”的逻辑轨迹或心路历程。“循名责实”的传统考据方法在这里仍旧保持着—展其身手的充分空间。

至于满族的起源与发展，在清代中国本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讨论的问题。那得照“钦定”的条则，由皇帝说了算。而当日的西方汉学家们，倒不受这种禁忌的约束。从克拉普罗特的著述算起，中外

学术界关心这个课题，大约已有二百年之久。这个很老的话题，自从族裔认同的观念被提出来以后，重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自然，满族在清代绝对算不得是一个“边缘”人群。不过，正因为他们掌控着国家的权力中心，这个从昔日的帝国边疆发展起来的边疆帝国，方才能动员它掌握的政治和文化资源，通过独特的“政治化”方式，促使直到那时候尚仍具有文化—军事共同体性格的“满洲”人群，最终演变为一个前现代的民族。此一过程当然留下了不少很值得加以阐发分析的新论题。

孙静在读博士的时候，即选择这个题目来撰写学位论文。毕业之后，又经过她好几年的推敲锤炼，这部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又经过反复修改的文稿，终于可以作为专著正式出版了。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她坚持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言。回想两年之前，我曾与她合作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追溯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过程及其结果。现在实在想不出还剩下什么有点新意的话可以讲。所以只好就族裔认同与民族或族裔群体的形成发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写几句老生常谈，聊以敷衍塞责。

2008年6月于复旦大学

摘 要

本书将人类学在民族界定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民族的主观认同意识或自我归属意识纳入满族史的讨论中，考察了天聪九年（1635）“满洲”命名前后直到清朝统治末期“满洲”共同体性格的历史变迁。

本书认为，在上述历史时期，满洲共同体经历了从一个来源复杂的征服者集团到对自身来源有着清晰意识的集团的转变。女真诸部在努尔哈赤时期力图建立自己与金、元女真的历史联系，这种努力由于皇太极改称“满洲”和“大清”称号而中断。入关前后的八旗满洲是按照特定的政治—军事制度组织起来的女真语部众。民族意识在他们中间的发育，由于征服初期的清政府刻意在八旗内部和整个中国回避满汉分别而受到抑制。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盛世的繁荣，与此同时，以“国语骑射”为代表的满洲传统文化却在迅速丧失，在这种背景下，清王朝“构建”满洲历史根源性的努力显著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洲的历史根源性被重新追溯到金元时期的女真人；二是对满洲主体部分“从龙”（跟随努尔哈赤起家）的集体历史进行了重新塑造。这种有意识构建的具有独特血缘与历史经历的新的满洲共同体表明，满洲共同体在自我定位的主观意识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清朝末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满族人的群体意识凸现、固化并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清朝灭亡后，旗民界限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中，满族身份的确定遂以是否具有旗籍为依据。

Abstract

Ethnic self-identity or self-ascription consciousness,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definition of ethnic in anthropology, is applied into the research of Manchu's vicissitude as community, from the ninth year of Tiancong 1635 when Manchu was nominated until the late of the Qing Dynast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during the above mentioned time Manchu community experienced the transition from conquering group to ethnic group. The attempt made by Jurchen tribes under the rule of Nurhaci to affiliate themselves historically with Jurchen in Jin-yuan was interrupted by Hong Taiji in the way of altering the name to Manchu and Great Qing dynast. The Manchu Eight banners around the time of entering the Shanhai Pass were tribal groups speaking Jurchen language and simply formed together by the political military system. The ethnic consciousness of tribal group was restrained because the Qing court deliberately ignored the discrimination of Manchu and Han in inner Eight banners and even the whole nation. The Qing Dynasty saw its prosperity under the emperor Qianlong's reign, but paralleled the rapid degradation of Manchu's traditional culture characterized with ethnic language and ride. With this background, the effort of constructing Manchu's historical root was strengthened notably, which can be manifested from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ly, the history of Manchu was rooted back to Jurchen in Jin-yuan over again; secondly, the main part of Manchu, namely that followed

Nurhaci was molded renewedly. The new Manchu group which was constructed consciously and possessed special consanguinity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dicates that Manchu community changed in the self-ascription consciousness. In the late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rapid change of the situa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Manchu's group consciousness solidified and rised to the political field. After the ruin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boundary of the banners and the masses became a kind of dominant idea, and developed approximately fifty years, in the 1950's ethnic identification, Manchu nationality status judged then by whether had the banner census register.

读者反馈卡

谢谢您购买这本书！

为了加强对您的服务，请仔细填写本卡各栏，然后邮寄给我们，您将不定期收到本社最新的出版信息。。

邮寄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辽宁民族出版社综合编辑室收
邮政编码：110003

购书地点：☐书店 ☐书展 ☐邮购 ☐网络

您从何处得知本书出版？☐杂志 ☐报纸 ☐广播 ☐书讯 ☐逛书店
☐书展 ☐其他 _____

您通常以何种方式购书？ ☐书店 ☐邮购 ☐书展 ☐超市
☐其他 _____

您购买这本书的原因？ ☐对书的内容感兴趣 ☐工作或生活需要
☐其他 _____

您认为本书的编排：☐赏心悦目 ☐设计平平 ☐有待改善 ☐其他 _____

您认为本书的封面：☐非常出色 ☐平凡普通 ☐毫不起眼 ☐其他 _____

您认为本书需要改进的地方： _____

您目前最期待什么样的书： _____

您是否需求某方面的图书却在市场中无法找到，或书中内容无法满足您的需求，请详述，也许我们能够满足您的需要： _____

您的个人资料：

姓名：_____ 性别：_____ 年龄：_____ 职业：_____

文化程度：_____ 联系电话：_____ E-mail：_____

邮政地址：_____

您的建议：

若对本书内容还有其他疑问，

欢迎您将问题用 E-mail 发至 lnmz@mail.lnpgc.com.cn

目 录

“族裔”认同与中国民族史研究	姚大力 1
摘 要	1
Abstract	2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关于满族形成发展问题的研究述评	1
第二节 从认同意识角度重新观照满族的形成与发展	19
第二章 从女真到“满洲”	29
第一节 “诸申”共名下的女真语诸部	29
第二节 八旗制的确立与后金统治下女真的聚合	35
第三节 入关前夕的“满洲”	52
第三章 冲突与调适：入关初期满洲认同的抑制	63
第一节 入关之初的满汉冲突	63
第二节 “满汉一家”的实践	72
第三节 八旗整体性的强化	81
第四章 旗内满汉差异的深化与全面显现	94
第一节 清朝统治的稳固	94
第二节 八旗汉军的边缘化	99
第三节 乾隆时期的汉军出旗为民	112

第五章 “满洲根本”的意涵	121
第一节 “满洲根本”的缘起	122
第二节 文化的衰落与“满洲根本”的塑造	131
第三节 满洲“根本之地”的保护与神化	142
第六章 满洲人的“世谱化”	154
第一节 归旗的行废与满洲人的离散	155
第二节 雍乾时期满洲集体性格的建构	165
第三节 “世谱化”对满洲认同的规范与强化	184
第七章 雍乾之后满洲认同的变迁	192
第一节 八旗的衰落与满洲认同的变化	193
第二节 “改良”、“排满”与满洲认同意识的演进	201
第三节 辛亥革命后的满族及其民族意识的嬗变	214
结语 满洲认同意识的历史嬗变	224
引用书籍、论文目录	230
附 录 谁是满洲人：综合书评	245
后 记	264

绪论

第一节 关于满族形成发展问题的研究述评

满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满族统治者在整个清朝始终居于政治支配者的地位。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与深入贯彻,满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均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根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满族人口以 1068 万之多在全国各少数民族中位居第二。无论从历史或是现实的角度看,满族对中国社会的进程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满族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始终是一个能够引起众多学者关注的领域。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一批成果。不过,从满族研究涉及的范围来看,还有进一步深入开拓的空间^①。1635 年,皇太极颁布“满洲”命名令,此后以“满洲”(辛亥革命后称为满族)为共同称谓的这个人们共同体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演进过程中,尤其是在关涉中国发展前途的很多重要关节点,满族的命运亦是跌宕起伏。那么,在诸多历史演变的重要时刻,满洲人是如何

^① 满族研究的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张杰指出:“根据《20 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一书统计,目前已经出版的满族研究著作、文献、论文集达 606 种,若加上该书的‘补充参考存目’又 252 种,总计为 858 种,包括遗漏之作,当在千种以上。满学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然而,细读这 858 种满学著作书目介绍,尽管其中不乏鸿篇佳作,也存在大量重复题材,例如,选题过多集中于清朝皇帝、满族风情、萨满祭祀、宫廷史话之类。”见,张杰、张丹卉著:《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1644—1840)》,第 2 页,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

看待自身并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发展策略的呢？战略的调整对于他们本身的发展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这种认识思路与学者们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讨论密不可分。一是在满族形成问题上的不同认识；一是八旗制度在满族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一、满族形成的时间和标志

满族的形成、发展、变化是一个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满族的形成成为它此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前提基础。而在满族形成的时间和标志问题上，学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传统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满洲”名称的出现即是满族形成的标志。中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满族简史》指出，“满族的名称是在明代末年（十七世纪初）才出现的。但是，它有着悠久的渊源。先秦古籍中所记的肃慎人，就是满族的最早先人。汉代以后，不同朝代的史书上分别记载的挹娄（汉、三国）、勿吉（北朝）、靺鞨（隋、唐）、女真（辽、宋、元、明），是肃慎的后裔，也是满族的先人。……十四世纪以后，居住在明辽东边墙外的女真人中，又一次分化出新的先进者——建州、海西诸部。十六世纪下半期，在努尔哈齐的领导下，建州女真统一了女真各部，并以此为核心吸收其他族人形成了满族。”^②此结论中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满族形成的时间是在17世纪初。这似乎已经成为满族史研究中毋庸置疑的定论。“满族是以女真为主，吸收部分汉、蒙等族成员，于明朝末年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③后来，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史，应是始建于明初的建州女真，完成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30年代。……关于满洲共同体形成的时间问题，一般地说，史学界没有分歧看法。”^④

② 王鍾翰主编：《满族简史》，第1—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 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第6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杨学琛：《清代民族史》，第1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④ 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载《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1949—2002）》，第348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35年，皇太极发布了一道谕旨，规定：“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女真），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⑤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甚或学者而言，这个事件已经成为满族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可以说，“满族是在1635年正式定名‘满洲’，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走上中国历史舞台的。”^⑥这种看法代表了满族形成的主流观点^⑦。

⑤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5，天聪九年十月庚寅，第463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版。以下清实录中引用材料均出自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⑥ 李燕光、关捷：《满族通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前言第1页。王文光也认为：“1635年皇太极废除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简称满族。至此，今天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中的满族正式形成。”王文光：《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第64—65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 说它是主流观点是因为在很多有关清代史及满族研究的论著中，都把17世纪初和天聪九年的上谕作为满族形成的标志。兹举几例，袁闾琨、蒋秀松等在《清代前史》的前言中指出：“公元1635年，皇太极改号称帝前夕，他发布上谕，宣称废除原有的诸申（女真）称谓，令今后以‘满洲’作为新的族称。这样，就标志一个以满洲族（后改为满族）称谓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最后形成。”（袁闾琨、蒋秀松、滕绍箴等：《清代前史》，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4页。）赵立静等在《满族家谱选》序中说：“满族形成于十七世纪初。……她的先世的主体，可上溯到女真，乃至远古的肃慎，他们长期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间，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文化。满族在形成过程中及形成之后，又大量吸收和融入了其他民族成分，特别是众多的八旗汉军的后人。可以说，像中华民族中许多兄弟民族一样，满族也是多元的统一体。”（赵立静等：《满族家谱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序第1页）；杨学琛认为：“天聪九年十月，皇太极定族名为满洲（后称满族）。”见《清代民族史》，第7页；李鸿彬认为：“天聪九年（1635）十一月，后金汗皇太极将其所属族名正式命名为满洲，故称之为满族，这标志着满族共同体最后形成，从此它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实体登上了历史舞台。”见李鸿彬：《满族崛起与清帝国的建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王景义提出，皇太极于1635年10月宣布以满洲族为统一的民族称号，标志新的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见《关于满族形成中几个问题的探讨》，载《满族研究》1999年第2期；杜成安在《女真官制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一文中指出，“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当为满洲共同体形成的起点，清太宗皇太极明告全国今后只准称‘满洲’而不许再用女真字样则是满族正式形成的标志。”见《满族研究》2001年第4期。

此外,还有一些间接涉及满族形成问题的研究也采取了上述主流观点。刘小萌在《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一书的前言中指出:“满族是17世纪初在辽东地区形成的一个新民族共同体,而构成其基本源流的那部分女真人主要来自东北北部和东北部的边远地带。满族先民的步步南下,在白山黑水之间形成了四个民族(女真、蒙古、汉族、朝鲜)三种文化(渔猎、游牧、农耕)并存互动的格局。外部的多重文化对于满族先民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这是满族意识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⑧

郑天挺、蔡美彪在致力于满族政治史研究时,也对“满洲”这一词语本身的含义作了细致分析。在《清初满族的统一》一文中,郑天挺对清初编年史的记载进行了仔细检讨并指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说,他的始祖建国,“其国定号满洲”,应该是国名;又说“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鹄为族,故不加害”,又像部族名或者是氏族名;又说,努尔哈赤生时,“是时有识见之长者言,满洲必有大贤人出”,又像是努尔哈赤的家族名。同一本书里,记载不同,互相矛盾。许多处称“满洲国”,仔细分析,指的还是满洲族。在努尔哈赤称帝以前,无论是努尔哈赤一家,建州卫一部,建州女真这一氏族,从未建立过国家,所以“满洲国”只是努尔哈赤的假想,最初可能他想要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后来随形势的发展,就把它扩大为表示全民族的名称了。最后,他总结说,满洲概念经历了从以国家主权为标准的满洲国到按语言统一的满洲族的变化。满洲这一新名称的提出,促进了满族的统一,也促成了努尔哈赤对东北地区的统一^⑨。郑天挺对“满洲”含义所作分析的文本依据是清实录,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实录中对“满洲”一词的使用是相当任意的,它是满洲人追述他们

^⑧ 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前言,第18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⑨ 郑天挺:《清初满族的统一》,载《及时学人谈丛》,第119—120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